

近代民信局的空间网络分析

徐建国

(厦门大学历史系 361005)

内容提要: 民信局作为近代重要的民间通信形式,在清道光、咸丰、同治时期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期,形成遍及全国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地区的通信网。这个通信网呈“T”字形分布,以上海为网络展开的枢纽,以沿海和沿江的经济枢纽城市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及周边省市延伸。无论是从民信局分布的密集度,寄递地点的广泛性,还是从业务量上来分析,东部地区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广大的西部落后地区并不在民信局通信网络的覆盖范围之内,使民信局空间网络呈现出通信网络的稀疏性、寄递线路的选择性、寄递地点的有限性、同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性等特点。

关键词: 近代 民信局 空间网络 分析

在近代中国通信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过一种重要的民间通信组织——民信局,目前关于这一组织的研究尚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在有关邮政的论文或专著中,民信局是作为邮政的对立物或附属物一带而过的,而且至今未见到关于民信局研究的专题论文出现。有鉴于此,本人不揣浅陋,拟就民信局的空间网络作粗浅的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近代民信局的发展概况

关于民信局产生的具体时间,学界尚无明确的说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大约产生于明永乐年间(公元1408—1425年)。民信局产生后,在4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比较缓慢的发展状态,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的。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人口流动的增强,推动了为人们传递信息的民信局的极大发展,到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达到发展的顶峰,全国民信局总数达3000多个。^①有的文献记载相比较3000多家和数千家的说法则更为夸张,按《清稗类钞》的记载,从同治初年开始,整个中国已达到“大而都会,小而镇市”,“东西南北,无不设立”民信局的地步。^②还有“就国内言,虽远至边陲如辽东、陕、甘、新疆各省,亦无不有民信局之设立。”^③就以上两种说法而言,全国范围内的民信局当不下万家。关于鼎盛时期民信局的数量,不是本文要考察的主要内容。但以上资料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明确指出,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民信局达到鼎盛时期。在此期间民信局形成遍及全国经济发达和比较发达地区的通信网络,它对于人们的书信传递、信息的沟通和货物的交流起了极大作用,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① 周臣孚、鹿荫棠编:《邮政法释疑》,人民邮电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关于民信局达到顶峰时期的数量,根据查找到的资料来看,并无比较明确的数字,绝大多数是以几千家、数千家等笼统的数字来表达,如王崇焕在《中国古代交通》(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1页)一书中提到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民信局发展到鼎盛时期,当时全国大小民信局共有几千家之多。几千家的伸缩空间较大,而《邮政法释疑》中提到的3000多家,是所能见到的资料中比较明确的说法,但缺乏有力的数据支撑,所以也还是一种估计。

② 徐珂著:《清稗类钞》第5册《信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90页。

③ 王桢著:《邮政》,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24页。

二、近代民信局的空间网络分析

(一) 民信局的网络结构分析

近代民信局的通信网络呈“T”字形展开, 其中的“一”指的是东部沿海地区, 北到东北三省, 南到闽粤; “I”指的是长江沿线, 下游到上海, 上游到重庆, 上海正位于“T”字形的中心, 成为民信局的汇集之地和网络展开的枢纽。

在上海兴起以前, 宁波一直处于民信局中心的位置。近代以后, 上海逐渐发展起来, 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宁波的中心位置下降, 民信局向上海转移, 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上海逐渐成为民信局的汇集之地, “各处民信局的总局, 大部分都设在这里。推设分局到各省都市, 再向内地扩展”。^① 这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 对民信局来说有巨大的业务需求; 二是上海的地理位置和比较发达的交通, 能够满足民信局迅速递转的需要。

上海作为民信局的枢纽, 它的辐射范围不仅包括周围地区, 而且面向全国。此外还在沿海及沿江地区的经济枢纽城市形成了数个大的中心, 华北以天津为中心, 华中以汉口为中心, 西南以重庆为中心, 东南以福州、广州为中心, 民信局的总号一般都设在这里, 这些城市的辐射范围比上海小, 一般是面向周围地区及周边的省市。

总号设在中心城市的民信局随着业务的发展不断到经济发达的中小城市设立分号, 民信局设立分号的特点是先在附近的城市设立, 随着业务的扩大向外延伸, 在本省内的重要城市设立, 最后才向省外扩展, 呈现出由内而外的特点。从湖北境内来看, 1822 年(清道光二年)时, 总号设于汉口的胡万昌民信局, 已分别在沙市、宜昌设立分号, 并向外延伸至四川的夔州(奉节)、万县、重庆和成都, 在这些城市设立了分号。1897 年时, 武穴有全太洽、政大源民信局, 沙市有全太盛、森昌、李永隆民信局; 1902 年时, 老河口有汪洪兴、森昌民信局, 黄石港有太古晋、全昌仁民信局; 1903 年, 樊城有汪洪兴、森昌民信局,^② 这些民信局都是总号设于汉口的民信局的分号。1891 年时, 宜昌设立的 3 家民信局分别是总号设于汉口的合昌、万昌和永昌民信局的分号, 这 3 家民信局除了在宜昌设立分号外, 还向外延伸, 在长江沿岸的沙市、夔州、万县、重庆等地设立分号。^③

东部沿海地区的民信局设立分号的速度更快, 数量更多。比如从 1825 年到 1828 年短短 4 年的时间里, 到浙江湖州府府城和其辖下的南浔镇、双林镇设立分号的上海民信局计有福润、永合和、老协兴、全盛和记、正源、林仁记、永泰丰等 7 家之多, 设立分号达 16 处。^④ 在天津, 同治年间有民信局 30 多家, 它们在直隶省内设有分号 50 家, 在省外设有 100 家。^⑤ 在海南, 1933 年时, 琼山(海口)、嘉积、中原、文昌、定安等处登记领照的民信局在海内外设有分号达 162 处。^⑥

即使是相对比较偏远的湖南道县、陕西长安县也都有民信局的设立。清道光年间(1820—1850), 湖南道县设立民信局, 通邮地点达 20 处, 长途包括永州、衡州、湘潭、长沙、宝庆、白水、全州及邻县。^⑦ 清咸丰、同治年间(1821—1874 年), 长安县有上海顺成民信局设立的分号。^⑧

从民国年间调查登记的若干民信局设立分号的情况可以想见其设立之普遍, 如福建闽侯的协兴昌民信局在各地设有分号 24 处, 上海顺成有 21 处, 各地登记的老福兴共计有 18 处。^⑨

① 楼祖诒编著:《中国邮驿史料》, 人民邮电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 56 页。

② 林学明、邹文斗主编:《湖北省志 交通邮电》,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718—720 页。

③ 政协宜昌市文史委编:《宜昌市文史资料》第 13 辑, 1992 年版, 第 237 页。

④ 政协浙江省湖州市文史委编:《湖州文史资料》第 9 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02 页。

⑤ 来新夏主编:《天津的邮驿与邮政》,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第 87 页。

⑥ 海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海南省志 邮电志》, 南海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2 页。

⑦ 湖南省道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道县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70 页。

⑧ 长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安县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35 页。

⑨ 参见张翔著《中华邮政史》, 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6 年版, 第 55 页。

除了采用设立分号的形式外,民信局还采用互相联号的形式向外扩展业务,“各处民信局,或互为联号,或另立分号,对于收寄递送事务互相协助”。^①互为联号的民信局在组织和经营上是独立的,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只存在互相寄递信件的业务联系。如在烟台,根据记载,1934年3月时登记的6家民信局全都是上海民信局的联号。^②

从能够查找到的相关资料上可以看到,设在两地或两地以上的民信局名号存在太多相同的现象,这不可能是巧合,而是或分号或联号的表现。下面仅举几例,比如在汉口和镇江,设在这两地的民信局名称相同的有全泰盛、松兴公、政大源、裕兴康、乾昌、协兴昌、太古晋、福兴润、全昌仁、老福兴、胡万昌、铨昌祥等12个。^③在安徽芜湖民信局的号名中也可见到全泰盛、松兴公、政大源、裕兴康、乾昌、协兴昌、福兴润、全昌仁、老福兴、胡万昌、铨昌祥等11个号名与汉口和镇江民信局的号名完全相同。^④在上海,也可以找到与上述名号完全相同的民信局^⑤,这有力地说明这些地方相互之间经济联系的密切和加强。

从总体上看,近代民信局的通信网络包含三个层级,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和重庆等大城市处于第一层级,民信局总号一般都设在这些城市;广大的中等城市如宜昌、烟台、成都、吉林、哈尔滨、宁波、温州等处于第二层级,民信局的分号一般都设立在这些城市;广大的府城、县城及重要的集镇则处于网络的第三等级,覆盖周围的农村。

民信局以沿海、沿江的经济枢纽城市为中心,先在周围的城市和集镇设立分号,覆盖周围的地区,然后向周围省的城市扩展,或设立分号或与当地民信局组成联号,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所以民信局呈现出点状分布,以点为中心向外覆盖的特点,从而把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和较为发达的地区联成一体,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推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又带动了民信业的进一步发展,两者之间形成明显的互动关系。

(二) 民信局的寄递地点和范围分析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可以比较明了地看出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中心城市的寄递地点分布和辐射范围。据《海关十年报告 1892—1901》记载,天津几家民信局^⑥的寄递地点^⑦包括其周围的小站、芦台、塘沽、通州,北京和直隶境内的保定、祁州(今河北安国)、获鹿、辛集、安平^⑧、顺德府(今河北邢台)、沧州、泊头、桑园、宣化、蔚州、张家口、多伦厅、山海关、南宫、大营、大名府、龙王庙^⑨、郑家口(时属直隶河间府故城县的一个村镇),山西的太原府、榆次、大同、丰镇、太谷,河南的道口、周家口、卫辉府、开封、怀庆府、新乡县,内蒙古的西包头、归化城,东北地区的营口、旅顺口、锦州、盛京、吉林、辽阳、

①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经济年鉴 1934》,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709 页。

② 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史志办公室复制:《山东邮电史稿》(上),1982 年版,第 23 页。

③ 参见《湖北省志 交通邮电》,第 718—720 页;镇江邮电局编著:《镇江邮电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2—53 页。

④ 《清巡警部档 民信局宣统二年六月呈文》,转引自黄鉴晖著《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2 页。

⑤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22—137 页。注:只有一处民信局的号名有出入,《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882—1931》原文为“兴裕康”,而在汉口、镇江和芜湖的民信局中无此号名,据查阅文中所列“兴裕康”的寄递地点,汉口、芜湖、镇江三地都在其寄递范围内,所以推断“兴裕康”应为“裕兴康”的误写。

⑥ 包括已在海关邮政挂号和未挂号的民信局。

⑦ 以下所有地点系根据当时的行政区划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作出的划分。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中华地图学社 1975 年版(内部发行)。

⑧ 原文写成安平州,查《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天津附近无安平州的行政区划,只有广西太平府辖境内有安平州,但它不可能是天津民信局的递送区域,而直隶境内的深州府辖区内有安平县,所以安平州当为安平县的误写。参阅《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第 40—41、5—6 页。

⑨ 从《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可以查到 3 处以龙王庙命名的地点,分别位于当时的直隶大名府、盛京奉天府、山东济南府,都是村镇,按照当时的情况推测,此龙王庙当指直隶大名府辖下的龙王庙。

新民屯、宽城子、铁岭、海龙城,山东的德州、临清、济南、烟台、周村、潍县,还有上海、吴淞等地。^①按照行政区划来看,包括山东、山西、河南、直隶、江苏、内蒙古、东北等地,遍及华北和东北的主要地区。

福州的寄递范围包括其周围的建宁府、崇安县、邵武府、光泽县、汀州府、兴化府、泉州府、厦门、漳州府、诏安县、南安、福宁府、^②台湾等地,向外扩展向南有潮州、广州,向北有宁波、杭州、泰兴、苏州、扬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以及华中的汉口。^③广州的寄递范围则不仅包括国内,而且远及海外,“如暹罗、缅甸、安南、海峡殖民地、爪哇、新西兰、菲律宾以及檀香山一带侨居该处之闽、粤人民,亦无不利用民信局以代递书信”。^④

汉口的寄递地点包括沙市、武穴、宜昌、长沙、九江、益阳、郴州、耒阳、安定、安庆、芜湖、大同(属安徽铜陵)、南京、镇江、上海、宁波、丰都、重庆、成都和北京、天津以及福州、广州、香港等城市,从大的区划来看包括湖北、湖南、河南、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陕西、云南、四川等省。^⑤

重庆的寄递地点及范围包括成都、泸州、叙州(今宜宾)、广元、嘉定(今乐山)、合川、顺庆、保宁、打箭炉(今康定)、潼川、射洪、绵州、遂宁、万县、夔州和贵阳、昆明以及长江沿线的沙市、宜昌、汉口等城市,包括西南地区的四川以及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西北甘肃的极少一部分地区,^⑥覆盖了西南主要地区及西北的部分地区。

上海的寄递地点则不仅包括周围地区,而且向长江中上游、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延伸。周围地区包括江苏境内的南汇、川沙、周浦、南翔、吴淞、嘉定、罗店、太仓州、沙溪^⑦、崇明、同里^⑧、通州(今南通)、金沙、白蒲、如皋、江阴、靖江、镇江、溧阳、丹阳、泰兴、南京、苏州、无锡、松江、孟河、常熟、洙泾、六合、湖熟、扬州、泰州、邵伯、高邮、兴化、仙女镇^⑨、山阳^⑩、清江浦、桃源、盐城、宿迁、徐州,浙江境内的温州、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湖州、镇海、慈、奉化、定海、余姚、上虞、新仓、嵊县、硖石、富阳、余杭、南浔、双林、乌镇、台州、海门、石浦、乍浦、桐乡、柴桥、平湖、枫泾、严州、衢州、常山、龙游、金华、兰(浙江兰溪县,“”是“溪”的异体字),向外延伸则包括安徽的徽州、芜湖、大通(指大通镇,属当时安徽省池州府铜陵县辖境)、广信府、安庆、九江、亳州、巢县、滁州、太平府、宁国府、和州^⑪、运漕、庐州府、

① 参见仇润喜主编《天津邮政史料》第1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6页。

② 原文写的是武宁府,据查阅《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当时并没有武宁府这样一个府级行政区划单位,只有江西南昌府管辖范围内有武宁县,但距离福州比较遥远,而且经济不发达,两省之间还隔着武夷山这个天然障碍,不可能包括在福州的寄递范围内,所以推断应该是紧邻福州府的福宁府。可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第52—53、54—55页。

③ 天津市档案馆、中国集邮出版社编:《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中国集邮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④ 《邮政》,第124页。

⑤ 《海关十年报告 1882—1901》(汉口),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邮票史 第1卷(1878—1896)》,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2页;林学明、邹文斗主编:《湖北省志 交通邮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0页;《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第5—6页。

⑥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 邮电电信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页;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 邮电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

⑦ 原文写成“沙头”,查《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并无沙头这个地名,只有广东广州府境内有沙头墟的地名,根据文中所列此民信局的寄递地点判断,这个地点应在苏、浙两省境内,应该是个村镇,而苏、浙境内无沙头这个地名,根据梅里、嘉定、浏河三镇都位于江苏太仓州境内,太仓州境内有沙溪镇,并且另据《太仓文史资料辑存》(第1辑)第81页记载:“吾人在百余年前,早有永义和和致大信局两家,在浏河、浮桥、双凤、直塘、沙溪、璜泾等地设有支局,并连邻县常熟、支塘、梅里为申常线”,所以判断沙头当为沙溪的误写。

⑧ 原文写成“同蠡”,查《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无此地名,根据该民信局的寄递地点判断,此地当位于上海附近的苏州府、常州府、镇江府境内,而苏州府辖境内有名为“同里”的村镇,“蠡”与“里”同音,推断“同蠡”当为“同里”的误写。

⑨ 原文写成“仙女庙”,查《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并无“仙女庙”这个地名,根据该民信局的寄递地点分析,该地点当位于江苏境内,而扬州府境内有“仙女镇”,所以推断“仙女庙”当为“仙女镇”。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第58—59页。

⑩ 原文写成山南,查《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没有山南这个地名,只有甘肃甘州境内有山南关的村镇名,不可能是上海民信局的寄递范围,而江苏淮安府城所在地名为山阳,推断山南当为山阳的误写。

⑪ 原文写成“和悦州”,查《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没有“和悦州”这个行政区划,根据所列该民信局的寄递地点分析,所说的“和悦州”应位于安徽境内,而安徽太平府境内有“和州”,推断“和悦州”应为“和州”的误写。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八册 清时期》,第50—51页。

六安州、凤阳府、颍州府,江西的九江、广信府、玉山、河口(镇)、樟树(镇),长江中游则包括武穴、汉口、沙市、宜昌、岳州、益阳、长沙、醴陵、湘潭,山东的台儿庄、济宁州,西南地区到夔关、万县、重庆、成都等地,沿海向南到达福州、泉州、厦门、漳州、潮州、汕头、广州、梧州、台北、台南、香港,沿海向北到达烟台、天津、北京、牛庄、吉林等地。^①按照省级区划来看,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山东、直隶、东北地区,把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和较为发达的地区都包括在内,可见其寄递范围之广泛以及上海在民信业中的枢纽地位。

从以上所列民信局的寄递地点来看,存在明显的互相重合现象,这是民信局网络展开的重要表现,各中心城市的民信局通过不断到别的城市开办分号的方式来扩大寄递的范围,增大民信局的网络空间。这就存在外地开设的民信局和本地民信局在业务上的竞争问题,本地民信局在收发本地信件方面处于明显的优势,外地民信局则处于劣势,为此,外地民信局往往采用任用本地人设立代理行的方式来增加竞争的优势。比如上海和广州、汉口民信局的关系就是如此,“在最南端,广州几家大行的经营范围同上海那些民信局的经营范围相重叠,在这项业务中占了最大的份额。在西部地区也是如此,大部分发送业务仍由几家不受上海支配的汉口民信局承办。上海的一些民信局虽在汉口、广州设有分支机构,也控制了那些地点附近的发送业务,但大多数是依靠那里的代理行来扩大发送网的。”^②

从寄递地点和范围来看,东部地区比中部、西部地区明显要多和大。而且,东部中心城市的民信局覆盖其周围地区的能力很强,表明这些中心城市对其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动日益密切。此外,东部沿海中心城市的民信局把东部连成了一体,这说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形成总体上的经济互动。汉口民信局的寄递地点和范围也比较广泛,但它只表明汉口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东部、中部地区经济联系的密切,只是一个点,形不成一个整体,反映了汉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东部和西部经济联系纽带的作用。从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来说,民信局的寄递地点和范围反映了西南地区内部的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的加强,但远没有东部地区那么密切。同时,也可以看出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南地区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缺乏紧密的经济联系。

(三) 民信局的数量分析

各地民信局的数量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民信局数量多;经济较发达地区,民信局的数量相对要少;而在经济落后的广大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民信局极少或根本没有民信局的存在,这从数量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据海关 1892—1901 年海关 10 年报告称,1901 年时在上海地区已登记的民信局有 46 家,未登记的有 25 家,总计有 70 家左右。^③在江苏镇江,据 1908 年的统计,民信局数量达 54 家。^④甚至于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广大集镇也设有民信局,而且有的不止 1 家。有人根据收集的民信局实寄封判断,从清代到民国初年,绍兴城乡下的集镇安昌、柯桥、斗门、马山、平水等地也都设有民信局,而且有的集镇,一地就有几家。^⑤在天津附近的宁河县,大清邮政官局开办前后,有本地开设或外地分设的民信局约 20 家,分布在芦台、宁河、汉沽、新河、北塘、军粮城、潘家庄、赤碱滩、东丰台等地,^⑥20 家民信局分布在 9 个城镇,有的城镇应该也不止有 1 家。

在福州,1877 年时福州城内外共有民信局 47 处。^⑦在厦门,1891 年时有民信局 23 处,到 1901 年

①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 122—137 页;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林省志 卷二十七 邮电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 页。

②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 99 页。

③ 《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 99 页。

④ 《镇江邮电志》,第 52 页。

⑤ 陈祝义、余鸿源编:《中国民间集藏大观》,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6 页。

⑥ 《天津的邮驿与邮政》,第 88 页。

⑦ 《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第 4 页。

时达到 30 处。^① 在广州, 1901 年时单登记挂号的民信局即有 70 家。^② 在海南, 清代沿海各县(州) 城和主要墟镇都设有民信局。民国 22 年(1933 年), 琼山(海口)、嘉积、中原、文昌、定安登记领照的民信局有 65 处。^③

在汉口, 1862 至 1874 年, 有民信局 11 家; 1891 年, 有 27 家; 1897 年时, 单挂号民信局即有 47 家。^④

而在西部地区, 民信局的数量相对要少得多。在重庆, 据 1891 年的调查, 有民信局 16 家, 其中 13 家以重庆为总局, 其分局设于成都等省内 48 个重要城镇, 另外 3 家是汉口信局所设的分局。成都只有胡万昌、曾繁昌、麻乡约信局的分局和世昌、大帮信局共 5 家。以后虽有所发展, 比如到清宣统二年(1910) 时, 重庆一地单未挂号的信局即达 23 家,^⑤ 但相比较东部地区来说, 还是少得多。

在广大的西部边远地区, 根本查不到有关民信局的记载, 它们邮政史的编写是从海关邮政或大清邮政开始的。

(四) 民信局的业务量分析

由于民信局属于民间服务行业, 不在国家的统一管理范围内, 所以关于民信局的业务量, 无法做出准确的估算, 但从民信局划归邮政统一管理后, 从事于该项业务的民信局要到邮局挂号, 并将其收寄的信件装成总包交给邮局寄送, 才有了相对准确的数字统计。^⑥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到宣统三年(1911 年) 民信局交邮局转寄的信件数如表 1。^⑦

表 1

年份	总包数目	重量(公斤)	总包内装信件数目	备注
1905	262 902	104 929	8 896 782	收寄与转寄数目
1906	246 797	90 798	7 892 134	收寄与转寄数目
1907	241 562	74 710	6 389 374	收寄与转寄数目
1908	415 712	83 029	8 042 953	收寄与转寄数目
1909	466 800	94 014	8 411 600	收寄与转寄数目
1910	441 400	86 080	7 409 600	收寄与转寄数目
1911	368 230	59 452	5 913 100	收寄与转寄数目

1911 年以后, 由于国家对民信局采取日益严厉的限制政策, 再加上国办邮局势力的扩张, 使民信局的业务量逐渐减少。

以上是全国范围内民信局交邮局寄递的业务量, 按地区来说, 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全国最大的业务量, 华中次之, 西南更次之。比如以江苏镇江为例, 1904 年时镇江民信局交邮局寄递的信件数量为 59. 55 万件, 1905 年为 81. 63 万件, 1906 年为 72. 13 万件, 1907 年为 47. 93 万件, 1908 年为 66. 80 万件。1904 年时, 交邮局寄递信件的总数排前六位的分别是广州、上海、镇江、汉口、芜湖、宁波; 1905 年, 镇江仍排第三位, 其它分别是上海、广州、汉口、宁波; 1906—1908 年, 交邮局寄递信件的总数连续 3 年排

① 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厦门海关志》编委会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 鹭江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289、331 页。
② 胡巧利著:《变化的时空——广州百年交通与通信概览》, 广州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99 页。
③ 《海南省志 邮电志》, 第 11—12 页。
④ 《湖北省志 交通邮电》, 第 718—720 页。
⑤ 王力军、李艳芬编:《集邮精选本 1955—1966》, 中国集邮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74 页;《四川省志·邮政电信志》, 第 250 页。
⑥ 说它相对准确, 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民信局没有按照规定在邮局挂号, 却仍然在暗中从事寄递业务, 所以这还不是民信局寄递的准确数目, 但可以从中看出民信局巨大的业务量。如据《光绪三十四年邮政事务情形总论》中说:“ 观邮政一切数目, 可知所有民局挂号者殆属其半”。见仇润喜主编《天津邮政史料》第 2 辑(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639 页。
⑦ 《中国经济年鉴 1934》, 第 711 页。

全国前四位的是上海、广州、汉口、镇江。^①就1905年来说,镇江交寄的总数是816 300件,全国的总数是8 896 782件,约占9.17%,如果加上上海、宁波和广州3个东部城市,单这4个城市交邮局寄递的信件总数所占全国的比例当在40%以上,由此可见东部民信局的业务量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三、近代民信局空间网络的特点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近代民信局的通信网络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从覆盖的地区看,都属于经济发达和较为发达的地区,具有比较稀疏的特点,其分号或联号的设立具有选择性。从经济发展状况看,经济越发达,设立的民信局越多,即使是代办所也设于处于贸易位置的农村集镇,而在经济落后地区则根本没有;从设立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密集,西部地区稀疏,尤其是广大的边远地区,根本没有设立,这说明民信局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商业部门,沟通商业信息和促进货物流通是其主要业务,用于沟通亲朋联系的信函寄递不占重要地位。而且其分号或联号的设立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即与总局所在城市具有贸易往来的地方。例如在汕头,1877年时,设于本处的3处民信局寄递的信函全部来自本地大大小小的200多家店铺,信件可达天津、牛庄、汉口、九江、镇江、芝罘、上海、香港、广州9地,并且在上海和香港均设有3处信局的分号,而在与其距离较近的福州、厦门、台湾则没有开通寄递信函的服务,更不用说开设分号了,“究其原因,是本埠与上述各地尚无贸易往来”。^②这也表明民信局的网络覆盖范围是十分有限的,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2. 从寄递的线路来看,集中于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地区的线路上。“民信局发达的地区,都在能获利的路班,无利可图或入不敷出的路班,就无人问津。”^③在经济发达地区的线路上,会出现多家民信局的寄递人员奔波在同一条线路上的现象,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如在天津,据海关1892—1901年的十年报告记载,挂号和未挂号的民信局每日寄递北京和保定线路的有老福兴、全泰盛、协兴昌、森昌盛、福兴润、三盛、立成、公义成、三顺、福和等十家之多。^④这说明民信局缺乏经营上的有效联系和相互协调,其经营者尚处于小农经济的经营理念中,缺乏合作共赢的新的经营观念。

3. 由于寄递区域的有限性,使民信局呈现出本地竞争,而与超出其寄递范围的民信局合作的特点。由于受规模、空间等因素的制约,民信局都有一定的寄递范围,对于超出其寄递区域的业务,采用互相寄递的方式完成。民信局“唯业务因需要而相互联营”,^⑤他们在业务上互相合作,交换各自收到的不在其寄递范围内的信件,这种业务联系可以在总号与总号之间、总号与分号之间或分号与分号之间进行,“至年终节比,各自结账,互存欠存款额,如数找解”。^⑥互相递送不在其经营范围之内的信函、汇款和包裹等,扩大了递送范围,降低了运行成本。

4. 有些地方的民信局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比较固定的寄递线路和业务范围。如在北京,鸦片战争后陆续开设了十几家民信局,其中有些形成固定的寄递路线,如全泰盛、森昌盛专寄三江、两湖、云贵、四川,立成、三义成专寄天津、保定,正大、三盛、三顺昌、福和等专寄奉天、吉林、黑龙江。^⑦有的地方的民信局则形成比较固定的业务,如在福州,1877年时设在福州城内的民信局共有17家,其中1家专门寄递各衙门的信件,4家在专门为盐商服务的同时兼顾其他业务,专门办理雇用脚夫工作的有8家,其他4家从事一般的信件寄递业务。^⑧虽然有的地方形成这种比较固定的业务和线路,但是属

① 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版,第383页;《镇江邮电志》,第53页。

② 《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第51—52页。

③ 《中国邮驿史料》,第54页。

④ 参见《天津邮政史料》第1辑,第80—86页。

⑤ 马楚坚著:《中国古代的邮驿》,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4页。

⑥ 马骏昌等著:《北京邮史》,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张一著:《民国丛书第二编 经济类 中国邮政》(上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⑦ 《北京邮史》,第34页。

⑧ 《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第4页。

于比较特殊的个案, 并不普遍。

5. 在民信局设立过多的地区, 存在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由于业务量的有限性, 设立的民信局过多, 自然导致业务的分散, 利润的减少, “盖局多则信分”, “分之则利自少”。^① 比如, 1900 年 7 月时在浙江湖州府所辖的南浔镇就有民信局 6 家, 1901 年 6 月时设在湖州府城的民信局有 11 家。^② 而在安徽芜湖县, 据一份档案资料记载, 1910 年时有民信局 17 家之多。^③ 设立的民信局如此之多, 并且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协调, 为了争取更多的业务量, 民信局之间自然展开激烈的竞争, 处于无序竞争的混乱状态。

结 语

民信局的产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进入近代以后, 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动民信局进入其鼎盛时期, 在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促进了近代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同时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 加强了亲情友情的沟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对通讯的要求越来越高, 民信局适应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模式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 其本身所具有的缺陷逐渐凸显出来, 它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① 《信局论》, 载《申报》1872 年 6 月 7 日。

② 《湖州文史资料第九辑》, 第 103 页。

③ 《清巡警部档, 民信局宣统二年六月呈文》, 转引自《山西票号史》, 第 42 页。